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经济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Economics

中国经济通史

元代经济卷（上）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Y
YUAN DYNASTY I

— 陈高华 史卫民 /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经济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Economics

中国经济通史

元代经济卷（上）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Y
YUAN DYNASTY I

陈高华 史卫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陈高华, 史卫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5004-6059-6

I. 中… II. ①陈…②史… III. 经济史—中国—元代
IV. 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1645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张报婕
封面设计 孙元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34.75

插 页 2

字 数 560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经济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Economics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印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建院三十周年献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总 序

吴承明

这部九卷本《中国经济通史》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原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的重点项目，课题名称“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大学的一批著名史学家担任各卷主编，组织各单位的学者参加，殚心协力，惨淡经营了十多个寒暑。部分分卷曾先行问世，饮誉海内外。现在九卷已全部完成，应经济日报出版社之请，一次付梓，除保留各分卷的名称之外，全书统一称《中国经济通史》。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我受嘱写这篇总序，荣幸之余，首先是向各卷主编和作者祝贺，再就几个有关问题略抒管见。

本书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夏、元、明、清九个分卷。自有文字的商代算起，亦跨越三十几个世纪。通古今之变，它是一部中国经济通史，今天我們也需要这样一部通史。经济史以研究过程为主，非如政治、军事史之着重事件，从编写体例说亦以通考长、中、短时段环境、社会和经济的演变为宜。

本书采取断代形式，各卷主编和作者都多年从事相应断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各卷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有基本一致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并通过研讨，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总线索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有大体一致的认识。本书认为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嬗递，而以战国时期各国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形成作为进入封建社会的标志。经济演变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制约，一般可以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一定的社会制度下经济运行的效果作为考察的主线。这样来看，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是曲折的，有进有退，但长期趋势是不断进步的。因而，

本书不认为我国漫长的封建经济有个上升的阶段，以后就走下坡路，而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中，旧制度逐渐松解，新的因素于焉滋生。

在总线索和总趋势大体一致的认识下，各断代即各分卷，以致一个分卷的各专题的撰写，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允许不同观点存在。这是本书强调的。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活动十分复杂，并受历代政治、军事、社会制度和时代思潮的制约，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个统一的写作规范；更是因为，任何历史都是人们对过去的认识，这种认识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深入、有所创新的。一部新的经济史，不是已有文献和著述的选择与综合，而应该在总体上和部分上，在资料、方法、观点上，都属新构，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本书就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把各分卷的撰写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其中许多都是作者埋首多年或倾力攻坚的课题；对于已有的结论，也参酌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有关学科的新进展，予以再考察。因而，每个分册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都有一系列的创新见解。这种发挥个人专长与集体智慧、允许不同观点并存的办法，国外也不乏先例，如《剑桥欧洲经济史》、《方坦纳欧洲经济史》等巨著都是这样，也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之作。

本书各分卷各专题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是以实证主义作为基本原则的。“实证”原是“确实”的意思。历史研究首先是求实，无证不信，故实证主义可说是史学的第一原则。我国史学有实证的优良传统，并发展出优秀的考据之学。不过，乾嘉以前的考据常是以经证史，受微言大义的限制，囿于个别事物，未能用实证主义原则来考察历史发展的过程。今天，则是以经过考证的、自认可信的历史事实，包括长、中、短过程的历史事实，作为唯一的根据。这种历史事实，代表历史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用于治史真是再好不过。因为它同时排除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一度出现的教条主义史学。那种教条主义史学等于重蹈“以经证史”的覆辙，并且具有目的论、决定论的倾向。这都是不符合实证主义原则的。

西方史学，自近代史学之父 L. 兰克以来，也是实证主义的，著名史学家 T. 蒙森·E. W. 迈特兰等也都是考证大师。但是，自十九世纪末起，实证主义就不断受到批判，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并受到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攻击。西方史学界之批判实证主义，抛开在本体论上所受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不谈，其批判是集中在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论上。马克思主义相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同时，我以为也应当承认人们对它的认识有相

对性。我们也许不能“终极地”认识某些历史事实，但能不断地接近它，前面我用“自认可信的”和“不断地创新”，即指其相对性。西方批判者的有些见解，如 B. 克罗齐强调历史认识的时代性，R. G. 柯林武德把历史看成是人的行为，强调认识是对前人思想的重演，这对增进我们的认识来说，也是有益的。事实上，西方史学迄今并未脱离实证主义，即使一个全部用经济分析构成的经济史著作，仍然先要考察其所用资料尤其是数据的正确性。至于五六十年代进入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它要求从一个一般规律和所研问题的初始条件推导出演变的结果；这只能用于边界分明的狭隘命题，在美国也没有多大发展。并且，其结论往往是预言式的，并包含目的论、决定论倾向，对历史研究来说，是不可取的。

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按其愿意，只是回答“是怎样”的问题，而不问所论事物或行为的是非善恶，即不作价值判断。孔德和斯宾塞都申明过这一点。这对于考察自然现象，亦可无碍。但用于史学，如果不作价值评判，怎能“以史为鉴”呢？不分析其利弊得失，怎能古为今用呢？历史学一向是价值分析的，而在经济史中，价值分析比之一般历史道德伦理的规范分析，更有它的难处。质言之，我们是以历史上的价值观为准呢，还是以今天的价值观为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部经济史本来应当具有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两种功能。在作实证分析时，应该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考虑。这就是说，要采取历史主义的原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贯彻历史主义的分析原则，即使不作任何价值判断，也能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说清楚，读者自会置评。而脱离历史条件，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评论，都是非历史的、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作规范分析时，则应当用我们今天的历史知识、现在的价值观，作为分析的规范，或评论根据。这种分析不仅分析历史事物或行为对当时经济发展的作用，还包括它对后代以致今人的影响或潜在效应。这也就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应该放在实证分析之后，说明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其实，今天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当我们后代人有了新的历史知识、新的价值观，我们的认识也就陷入历史局限性了。

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 19 世纪晚期才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其所以分离出来，是因为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在我国这个分离过程

更晚，大体在20世纪前期。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经济史是属于历史学系统呢，还是属于经济学系统呢？已问世的经济史著作，从其体例、论证方式以及文章风格看，有更近于历史著作的，有更近于经济著作的，大约以前者为多，本书似也属于前者。其实，这并不是原则问题，两种类型的经济史并存大有好处，可收互补之效。我以为，重要的是经济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在经济史刚从历史学分离出来的时候，西方有人主张经济史应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如瑞典的赫克舍尔（E. F. Heckscher），他并主张历代经济史都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经济理论即供求理论之上。他的主要著作即《重商主义》，确实是非常出色的。但不是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样的。我曾多次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这些经济理论或学说，大都是经济学家根据过去的而主要是作者当代的经济实践总结或抽象出来的，目的在指导当时的经济实践；但时代过去，它就只具有方法论（思维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的意义了。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上某些经济现象的时代特征、边界条件和资料的可能性，选用某种经济学理论来进行分析，但不能把全部经济史建立在某税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供给与需求固然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但究竟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历史上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萨伊定律曾经被奉为圭臬，但边际主义出来就发生动摇，到凯恩斯主义就根本被否定了。与经济史关系密切的经济增长理论变化尤大，并且任何一个增长模式都只能包括三四个增长因素，其余只好“假定不变”，或设一个代表“余值”的不定因素。J. A. 熊彼特英明地把他那部繁洁而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并在“经济分析的技术”一章中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经济史学者对于所有经济学理论都应当这样看。

另一方面，熊彼特把经济史作为经济分析即经济学四种基本学科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有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感”、“历史经验”云云有点抽象，但确实很重要。一部经济史不能像经济学那样只讲“纯经济的”现象（熊彼特语），而要求经济史家要有明确的历史观和整个历史学的修养，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习俗心态等各方面来考察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近年来，文化方面日益受到重视，认为经济演变不能脱离文化思想的制

约，本书还特别把历代经济思潮列入课题。当前，经济学日益走向模型化和数学化，以致全部变成方程式解答。我们研究经济史也应注意定量分析，或根据资料显示，从经济学中吸取一些方法，如投入产出、回归分析等，但不宜轻易“建模”，限制史学思路，更不能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而是力求有更完整的历史，给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总之，历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宝藏，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以上拙见，谨借本书出版之，求教于读者。

目 录

第一编 综论

第一章 生态环境	(3)
第一节 经济区域的划分	(3)
第二节 农业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6)
第三节 牧业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9)
第四节 渔猎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12)
第二章 人口、民族和阶级	(15)
第一节 元代的人口统计数字	(15)
第二节 人口分布状况	(19)
第三节 民族分布状况	(21)
第四节 阶级和阶级关系	(32)
第三章 经济管理机构	(38)
第一节 蒙古国时期的经济管理机构	(38)
第二节 元朝中央行政机构中的经济管理部门	(43)
第三节 元朝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及其经济管理功能	(53)
第四节 元朝的基层行政编制与村社制度	(63)

第二编 部门生产和管理

第四章 农业生产概况	(69)
第一节 粮食作物	(69)

第二节	经济作物	(84)
第三节	农业生产工具、技术和粮食产量	(104)
第五章	农业政策与管理	(118)
第一节	农业政策的变化	(118)
第二节	屯田与垦荒	(127)
第三节	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	(139)
第四节	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	(148)
第六章	土地制度	(161)
第一节	官田的来源、数量和地租	(161)
第二节	赐田和职田	(169)
第三节	屯田的经营和管理	(178)
第四节	民田、寺观田、学田	(185)
第七章	手工业	(196)
第一节	手工业的一般情况	(196)
第二节	纺织业	(204)
第三节	制瓷、制盐和矿冶业	(212)
第四节	武器制造、造船、印刷和酿酒业	(222)
第八章	牧业和渔业	(231)
第一节	牧业的基本状况	(231)
第二节	官马、市马和括马	(237)
第三节	渔业的状况	(241)
第九章	交通运输	(248)
第一节	交通路线的开辟	(248)
第二节	交通系统的维护	(252)
第三节	交通工具	(257)
第四节	运费的调整	(263)

第一编

综 论

第一章

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元朝疆域内，按照居民的主要经济和生活方式，可以划分为牧业经济、农业经济和狩猎渔业经济三种区域。各区域的生态环境不同。

第一节 经济区域的划分

公元一二〇六年，出身于蒙古乞颜部的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草原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东征西讨，扩大了蒙古国的疆域。一二六〇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即位，效行“汉法”，按照中原王朝传统的统治模式确立了行政管理等系统。一二七一年，忽必烈将国号改为“大元”。一二七九年，忽必烈灭南宋统一全国，随后又对行政机构、军事组织、财政赋税等进行调整，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和管理。忽必烈于一二九四年去世，后继者有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诸帝。一三六八年，顺帝率众逃出首都大都（今北京市），重返草原，明军随即占领大都，元朝的统治崩溃。从一二〇六年到一三六八年的一百六十余年内，尤其是从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八年的一百余年中，在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出自游牧民族的统治者采取的各项政策，左右着在不同经济形态下生活的各族人民，营造了与前代有别的经济形势和生活内容。

按照元朝人的自述，自南宋灭亡之后，“四海混一”，“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霄、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

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① 元朝的疆域，“北越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② 除了今天中国的疆土外，还包括今蒙古国全境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面积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疆土的两倍。

为了有效地管理如此广袤的国土，元朝统治者以行省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分天下为十一省，以山东西、河北之地为腹里，隶都省，余则行中书省治之”。^③ “腹里”即内地的意思，专指中书省直辖地区，辖境包括今山东、山西、河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大部分地区。先后设置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有以下十个：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省治辽阳（今属辽宁省），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至大海。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辖境包括今陕西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部分地区。

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成都，辖境包括今四川省、重庆市大部及陕西、湖南两省部分地区。

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省治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中庆（今云南省昆明市），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和四川、广西两省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杭州，辖境包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省南部地区，以及江西省部分地区。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龙兴（今江西省南昌市），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 and 广东省、海南省。

湖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大部分地区及湖北省南部地区。

① 《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朝文类》卷四〇。

②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③ 《经世大典序录·都邑》，《国朝文类》卷四〇。

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和林(后改名和宁，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辖境包括今蒙古国全境，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除了上述十个行政区划外，元朝还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包括今西藏自治区全境及四川、青海部分地区的“吐蕃地区”，作为与行省平级的行政区划。

按照居民的主要经济生活方式，元朝的疆土可以划分成农业经济、牧业经济和狩猎经济三种区域。农业经济区域的面积约占全国疆土面积的三分之二，包括中原、江南、陕川、辽东、云南、吐蕃等地区。牧业经济区域约占全国疆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主要集中在漠北和漠南，即中书省北部和岭北行省南部地区。狩猎经济区域约占元代疆土的六分之一，主要是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北部的森林地区，云南等地也有一些森林地区，属于狩猎经济区的范围。除了农业、牧业、狩猎业之外，元代还有一部分居民主要从事或兼营渔业。中国大陆东南的海洋和大陆上的江河湖泊，便是渔业活动的场所。

中原农业经济区与草原游牧经济区的分界线是很明显的，就是横在漠南草原南端的燕山山脉。由中原北上，穿山越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①，出峡谷则入平陆，“始见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②这是一条自秦汉以降早已形成的传统分界线。蒙古人对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区分是很清楚的，尽管有人曾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③，但作为游牧民族一分子的统治者采取的是基本维持农业区与牧业区传统分界线的做法，并没有将牧业区无限制地延伸到农业区。

农业区内，也有两条明显的分界线。中原麦作区与江南稻作区的分界线是淮河与秦岭。淮河与秦岭既是中国暖温带地区与亚热带地区的自然分界线，也是南宋与金朝对峙的边界，在淮河与秦岭南北居住的虽然都是汉族，但是经济生活和社会风俗已有明显的差异。南岭是中国亚热带地区与热带地区的分界线，突出的标志是大庾岭上的同一品种的梅花树，南北坡开花的时间不同，从汉代以来对此已有所认识，元人承袭前说，亦明确指出：“大庾

①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见王国维笺证《蒙古史料四种》。

② 张德辉：《纪行》，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〇〇。

③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楚材传》。